



# 民商事诉讼实务前沿

2024年10月刊

上海市律师协会  
民商事诉讼业务研究委员会  
编委会

王正 关峰 彭筱剑 施磊  
莘欣 周郁婕 裔沁玮 肖文婷  
薛娟 谭勇 叶枫 顾巍巍  
赵国庆 王屹东 白翔飞 金艳韬  
王彦 沙兆华 周云涛 沈悦

# 目 录

## • 新规速递

- 关于印发《上海市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推进办法（试行）》的通知 ..... 3
- 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作出修订..... 7
- 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负责人就《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修订情况答记者问.....8

## • 业务动态

- 浦东法院发布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白皮书案例.....14
- 厦门小额诉讼案件诉讼费按四分之一标准交纳..... 31

## • 实务研究

- 关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法官这样说..... 33
-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41

### 关于印发《上海市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推进办法（试行）》的通知

来源：上海市司法局

发布时间：2024-06-24 实施日期：2024-08-01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40624/04035dcc4f3b4cb38ad2bdbc22d0c4e5.html>

#### 沪司行规〔2024〕1号

#### 上海市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推进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积极探索涉外商事海事领域临时仲裁，按照国家部署，根据《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临时仲裁，是指根据《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具有涉外因素的商事海事领域，以上海为仲裁地、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进行的仲裁活动。

第三条 下列涉外商事海事纠纷可以约定进行临时仲裁：

- （一）上海市注册的企业之间的；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注册的企业和境内外当事人之间的；
- （三）境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的企业之间的。

外国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企业之间的商事海事纠纷，以上海为仲裁地进行临时仲裁的，适用前款规定。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临时仲裁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公正独立、意思自治、高效经济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方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条 当事人可以通过下列方式选定临时仲裁案件的仲裁员：

（一）从上海仲裁委员会公开发布的临时仲裁推荐仲裁员名录中选定；

（二）从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设立的业务机构（以下简称境外仲裁业务机构）的仲裁员名册中选定。

当事人还可以约定由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境外仲裁业务机构或者请求上海仲裁委员会协助，指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规定条件的人员担任临时仲裁案件的仲裁员。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支持上海仲裁委员会和全国性、上海市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有关仲裁程序的规定，参考国际通行规则，制定并公开发布临时仲裁规则，供当事人约定适用。

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适用国际通行仲裁规则或者约定具体仲裁程序，但其约定应当能够实施。

第七条 上海仲裁委员会和其他有关行业协会、商会制定的临时仲裁规则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定上海为仲裁地；

（二）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和仲裁案件管辖权异议等方面的处理；

（三）仲裁开始、审理和裁决等程序和期限；

（四）仲裁员指定、回避和替换等仲裁庭组成（以下简称组庭）以及仲裁员利益冲突披露等程序和时限；

（五）保全和其他临时措施；

（六）裁决的作出、形式、效力、更正等；

（七）送达或者通讯、语言、保密等；

（八）仲裁费用的构成、标准、交存、分担等；

（九）其他有关规定。

第八条 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订立以上海为仲裁地的临时仲裁条款，也可以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以上海为仲裁地的临时仲裁协议。

当事人可以在临时仲裁条款或协议中约定仲裁语言、适用法律、开庭地点和庭审方式等。

第九条 鼓励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境外仲裁业务机构制定临时仲裁服务指引，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或者请求，提供以下临时仲裁服务：

- （一）协助组庭；
- （二）仲裁庭秘书服务；
- （三）保全等临时措施协助办理；
- （四）收取仲裁费用预付金等案件财务管理服务；
- （五）提供开庭室和庭审设施，安排翻译、速记，提供通讯服务等庭审相关服务；
- （六）案卷保存；
- （七）其他经当事人申请或者仲裁庭认为有必要的，可由仲裁机构提供的临时仲裁服务。

第十条 当事人可以直接约定组庭、仲裁庭秘书、庭审服务等事项，也可以约定由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境外仲裁业务机构担任指定机构提供临时仲裁服务。

当事人对组庭等事项或者指定机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或者根据案件适用的仲裁规则仍不能确定组庭等事项的，可以请求上海仲裁委员会协助。上海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提供协助组庭等服务。

第十一条 仲裁员应当保持独立公正，加强对虚假仲裁的识别防范，公平合理地处理案件。

仲裁员在被指定时和仲裁程序期间，应当及时向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员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造成影响的信息。

仲裁庭应当根据案件适用仲裁规则的规定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和程序，及时作出裁决，避免不必要的延误和费用。

第十二条 临时仲裁案件的裁决书一般应当载明裁决作出的日期，并经仲裁员签名，对裁决持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可以签名，也可以不签名。

第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交纳仲裁费用。临时仲裁案件的费用一般包括仲裁员报酬、仲裁员办理案件的差旅费和其他合理开支，以及指定机构的服务费用等。

仲裁员报酬和开支的收费标准由当事人与仲裁员协商。临时仲裁案件适用的仲裁规则已包含仲裁员报酬和开支的收费标准，或者案件指定机构已有收费标准的，可以按照标准执行。

第十四条 仲裁庭可以自行保管临时仲裁案件的案卷材料，也可以由当事人委托约定的指定机构保管案卷材料。

第十五条 支持上海仲裁委员会开展下列工作：

- （一）加强理论和实务研究，为临时仲裁活动开展提供参考咨询；
  - （二）制定并推广临时仲裁规则和示范条款，发布推荐仲裁员名录和有关工作指引；
  - （三）在遵循仲裁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征集并发布临时仲裁案件类型、数量等信息，发布经当事人同意并作脱敏处理的临时仲裁案例；
  - （四）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提供协助组庭等服务；
  - （五）开展仲裁员职业道德和业务知识培训，提升识别防范虚假仲裁的意识和能力；
  - （六）开展宣传交流，引导经营主体选择临时仲裁解决争议。
- 支持上海仲裁委员会建立健全临时仲裁相关工作机制。
- 鼓励仲裁员申请加入上海仲裁委员会。

第十六条 临时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确认、保全措施和仲裁裁决撤销、仲裁裁决执行等司法案件申请，当事人可以向本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第十七条 到本市参与临时仲裁程序的仲裁员、当事人、代理人、证人等外籍人员和参加仲裁相关会议、访问、交流等活动的外籍人员，可以申请由指定机构或者上海仲裁委员会协助依法办理口岸签证。

鼓励上海仲裁委员会和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境外仲裁业务机构为适用本办法开展的临时仲裁活动提供服务咨询以及场地、设施等便利。

第十八条 市司法局负责依法推进和指导本市临时仲裁相关工作。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

### 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作出修订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4年09月29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2e5tnDouotdEr0JO9P8pLg>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对《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作出重大修订，指标由26项调整为18项。

此次修订体现以人民为中心、遵循司法规律的价值理念，引导各级人民法院树牢“如我在诉”意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用最优质量、最高效率、最佳效果处理好每一个案件。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一是取消部分分析价值可被其他关联指标或者业务指导取代的指标；二是将一审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生效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分别合并调整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引导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依法履行纠错职能，树立“当改则改”的工作导向；三是调整部分指标的业务口径，确保统计结果更精准、更符合办案实际；四是经过充分调研论证，调整部分指标的区间参考值，防止片面追求较优数据，加剧一线法官工作负担。

此次修订突出强调指标体系“体检表”功能定位，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托数据会商机制加强审判态势分析研判，促进和保障审判工作健康有序运转。同时，不断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减少通报频次，规范使用指标数据，坚决杜绝排名排序，引导各级人民法院树立正确政绩观，将更多精力聚焦到审判执行主责主业上来，努力以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作者：章扬

编辑：李璇



### 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负责人就《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修订情况答记者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4年09月29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uhoE2PcYYXUTC1Hx903rWw>

近日，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要求，不断做优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审判执行全过程、各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修订后的《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负责人就本次修订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的运行情况和本次修订的背景。**

答：人民法院的主责主业是审判执行工作。管住案，是管好人、治强院的落点，是把党建、队建落到实处的必然要求。提升案件质效，需要法官自律，更需要科学管理。因此，有必要将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作为案件质效的“体检表”，以质量优先、兼顾效率、注重效果为导向，引导各级人民法院从检视出的问题中发现、纠治工作中的不足，在全面提升审判质效、实质性化解矛盾上狠下功夫。

2024年1月，经过近半年的试运行，全国法院开始适用《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含26项指标，多数指标设合理区间参考值，在区间范围内即为达标，防止盲目攀比、追高压低。需要强调的是，指标设置从一开始就以“**精简和必要**”为原则，力戒繁琐冗余。2023年第三季度在11个省份试点时，探索设置了29项指标。第四季度在全国法院试行时，调整为28项。2024年1月正式施行时，又压缩为26项。



2023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法院以指标体系为牵引，定期对照体检、分析会商、靶向施策，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效果提升明显。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26项指标中有23项同比趋优、向好。案-件比、审限内结案率、超12个月未结案件比、执行到位率等指标在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导向性、督促性作用。实践证明，指标体系总体上是符合司法规律、科学务实管用的，有利于促推各级人民法院改进工作、提升审判质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同时，我们也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法院在运用指标体系过程中，仍然存在变形走样、背离规律的现象，增加了基层负担。**例如**，有的法院抱持“唯数据论”的错误政绩观，将抓指标等同于抓工作，额外增加不科学、不必要的指标，把指标任务层层摊派、逐级加码，令一线法官不堪重负、无所适从。**又如**，有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热衷于对辖区法院张榜排名，甚至在已进入合理区间情况下仍通报名次，导致基层跟风攀比，为名次所累。**再如**，有的法院不能系统地、辩证地看待指标体系，要么为片面追求绝对的“低改发率”而“能维持尽维持”，要么为美化诉前调解数据刻意压降收案数量，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

针对上述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切实纠治实践中存在的对指标体系理解不准确、运用不科学等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深入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个人访谈等方式，全面听取了三级法院意见。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的法院干警认为指标体系是分析研判审判运行态势、开展审判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助推严格公正司法，很有必要，应当完善好、运用好，充分发挥促推提升审判质效的作用。**同时，大家也建议，可以根据实践运行情况，进一步优化、精简现行指标体系，更加聚焦解决制约审判质效的深层次问题，把指标评价成效更多体现在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上。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充分听取上述意见基础上，决定修订完善指标体系，进一步精简现行指标，改进数据通报机制、降低通报频次，突出强调指标体系查弱项、促提升的作用。同时，还决定全面取消立案、执行等具体工作条线的质效评估指标，只保留精简后的指标体系这“一把尺子”，防止多头评价，做到统一、规范，将为基层减负做深做实。

**问：请介绍本次修订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答：本次修订后，指标体系从26项减少到18项，精简比例达三分之一，部分指标的业务口径、合理区间参考值也作了优化调整。修订指标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是：

**第一，坚决贯彻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决策部署，把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做优。**全国有3500多家法院、12.7万名法官，指标体系必须抓主要、管重点。同时，全国89%以上的案件都在基层法院，指标的功能重在评价和促推，决不能“唯数据论”，额外增加基层负累。数据通报的频次也应当精简，用来通报的指标应当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具有引领、提示、督促价值。因此，为基层减负工作必须把“减”和“简”抓准抓实，以符合司法规律作为基本考量。经过深入研判、对比分析，这次修订直接取消了6项分析价值可被关联数据或业务指导取代的指标。**例如**，法官人均结案数是由收案体量和法官数量决定的，与所在地区经济水平、政策变化、人口规模等客观因素有关，各个地区、条线差异很大，过分追求必然异化为基层负担，不宜作为评价指标。**又如**，一年多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部门有效指导下，制发司法建议已被各级人民法院纳入日常工作机制，实践中也已总体做到遵循确有必要的原则，无须再专设相关指标。上述精简，有利于进一步松绑解绳卸担子，助力基层轻装上阵，激励广大干警更好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聚焦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指标体系是参照人民群众对审判质量、效率、效果的需求设置的，目的就是让各级人民法院定期检视问题、改进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实践中，决不能为了“数据好看”而让群众“事情难办”，更不能本末倒置，将审判执行工作变成“围着数据转、奔着数据干”。**例如**，起诉、上诉、申诉、申请再审都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相关案件数量如果增长，应该成为我们改进工作的压力，但不能异化为限制诉权的冲动。本次修订中，针对一些法院过度追求“低改发率”甚至“零改发率”的做法，我们将一审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生效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分别合并调整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引导中级以上法院在纠偏纠错时，树立“**当改则改、慎重发回、定分止争**”的工作理念，尽可能依法直接改判，减少不必要甚至不负责任的发回重审，防止程序空转，尊重和维护当事人诉权。**还比如**，部分法院为了追求诉前调解成功分流率和诉前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达标”，存在在诉前阶段强推调解、不及时立案行为。本次修订经充分调研论证，对这2个指标设置了更趋合理的区间参考值。

这样有利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开展好调解工作，促推多元解纷、有效分流，该立案的及时立案，做实“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让调解工作贯穿诉讼全程，切实减少群众讼累，实现优质高效解纷。**需要指出的是**，本次修订过程中，也有地方法院建议取消或压减二审开庭率指标，但我们认为，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二审案件程序透明度和庭审实质化水平，有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促进服判息诉，仍有必要保留。实践中，二审是否开庭应当依照诉讼法、司法解释和个案情形决定，发挥好二审终审和定分止争效果。根据各级人民法院建议，我们剔除了撤回上诉、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案件，以加强对二审开庭案件的监督管理，确保符合法定条件的二审案件均得到开庭审理。

**第三，尊重司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更加注重促推提升审判质效。**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宜孤立看待、机械管理，应当更加注重系统分析、综合判断指标之间的互动关联。每个指标都是某一领域客观情况的反映，都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不是所有指数都高或都低就是好，更不能为了追求所谓“样样好”，造假、注水导致“反管理”。本次修订，我们注重从源头上遏制类似“反管理”行为，引导各级人民法院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看待指标升降，让一线法官投入更多精力不断提升审判执行质效。**例如**，平均结案时间只是审限内结案率的补充，是一个分析性指标，不是越短越好，更不能直接用于对基层法院的考核，防止基层尤其是人案矛盾严重地区的法院不得已而“结案了事”。本次修订在调整平均结案时间区间参考值的同时，专门强调不得将该指标直接套用于某一层级、某一个法院、某一特定类型的案件。类似不得简单套用的指标，还包括案-件比、申诉申请再审率、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这些都是综合反映省级辖域内三级法院整体质效情况的，不应当也不适宜用来评价某一个具体法院。**还比如**，设置案-件比指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一次性解决纠纷”和“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需求与期待。一“案”衍生的“件”数越多，所经历的审执程序就越多，投入的司法资源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就越高。本次修订，我们调整了案-件比的业务口径，确保统计结果更精准、更符合办案实际。

**第四，坚持“体检表”定位，提升通报方式和运用机制的科学性。**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强调，指标体系是对各省级地区整体审判质效的全面检视，是客观反映审判工作的“**体检表**”，而非评判办案绩效优劣的“**成绩单**”。生活中的“体检表”运用场景就颇能说明问题，我们从医院拿到体检表后，会根据身体指标情况，针对性调整饮食结构、加强体育锻炼，或者寻医问诊、对症下药，过一段时间再复查问效。现实中，“反管理”行为之所以时有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指标体系制定、管理不尽科学，加之错误的政绩观所导致。

另一方面，审判质效提升和指标数据改善是一个渐进过程，对短期内出现的数据波动，应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为下级法院改进工作预留必要的时间空间，不宜过于频繁的通报。为做优做实指标体系的“体检表”定位，本次修订内容还包括通报和运用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将减少通报频次，每季度数据会商后，随会商纪要下发指标数据通报。通报的仅是相关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审判执行工作的运行情况，不涉及其他地区，更不包括排名信息。凡已进入合理区间的，即可视为符合审判质效要求。这样有利于大家和自己比、和去年同期比、和工作改进前比，更有利于做实做优审判质效不断提升。少数法院指标数据有明显异常变化或长期偏离合理区间时，应当“点对点”作出提示和建议，确保“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重点依托司法审判数据会商机制，系统地、整体地看待本辖区、本院的各项指标，不断提升分析研判能力水平，将“会商”打造成为高质量“会诊”，促进和保障审判工作更加健康有序运转。

**问：我国幅员广阔，如何解决指标体系在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体量法院的差异化适用问题？**

答：指标体系是衡量全国法院审判质效的“一把尺子”，打破了从前各地法院开展审判质量管理工作各行其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局面，发挥了很好的“风向标”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发展还不平衡，即使在同一省辖区内，不同法院的案件体量、人员素质、基础设施、司法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对最高人民法院来讲，既要做好统一设计，又要尊重地方实际，充分调动各级各地法院干警的积极性。

指标体系试运行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法院采取差异化的适用方法，在使用区间参考值时不能搞“一刀切”。实践中，有的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良好的探索和示范。**例如**，浙江法院按照法官人均结案数量，将地区、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划分为三组，对效率指标设定不同区间参考值。这样的差异化适用，可以提升不同条件法院之间的可比性，形成正向激励效应，避免显失公平的竞争。

本次修订，我们再次强调，指标体系设置的合理区间参考值仅应作为各省级地区整体审判质效的参照标准，不适用于某一层级、某一个法院或者法官个人，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收结案数量、人均结案数量、案件结构、队伍素质等因素，制定适用于本辖区不同法院的差异化评价标准。在此前提下，可以对部分法院适用的合理区间参考值作出适当调整。

**问：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如何抓好修订后指标体系的落实？**

答：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聚焦严格公正司法，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化科学的审判管理，久久为功持续完善为基层减负举措。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在开展本辖区审判质效考评工作中，不得在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之外增加其他考评项目，正在使用的应当检视、取消，坚决杜绝加码考评、重复考评。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今年11月1日前就本辖区正在使用的审判质效考评类项目作出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并对其中明显不妥、可能增加基层负担的内容提出整改意见。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辖区审判质效考评类制度文件，必须于正式印发后30日内，以院名义向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报送备案。对本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的类似文件，各高级人民法院也应严格审查管理。

做优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必须把主体责任压实到各地各级法院、落实到各个庭室部门，推动各个业务条线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多管齐下、科学协作、形成合力。各高级人民法院必须负好总责，动真碰硬整治整改，加大对本辖区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数据真实性和办案规范性的核查检查力度，坚决禁止把指标压力不当传导至具体个案。全国法院“一张网”建成后，最高人民法院还将依托数据中台和算法模型，逐步增强对办案数据的交叉校验、常态化巡检、智能预警等能力，及时在全国范围内通报数据异常的地区和法院，为指标体系更加科学、精准的运用夯实数据基础。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编辑：李璇



## 首次！浦东法院发布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白皮书

来源：上海浦东法院 发布时间：2024年10月11日 20:37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gv3o8bn87Q0cOVfWoYnXmQ>

“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绿色金融高速创新发展，也对人民法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全国基层法院首家金融审判庭是如何为绿色金融提供司法支撑的？服务保障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又取得了哪些成效？

10月10日上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18年-2024年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白皮书及典型案例。这是**浦东法院首次就绿色金融召开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也是**“抓实公正与效率——深入推进上海法院工作现代化”系列发布会**的第28场。

会上，浦东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包晔弘通报了浦东法院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审判情况，浦东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主持工作）余韬介绍了8起涉绿色金融商事审判典型案例。发布会由浦东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院新闻发言人王治国主持。

### 收案分析

白皮书显示，2018年至2024年6月，浦东法院共受理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872件。

- **从收案数量上看**，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数量逐步增长，2018年至2021年间案件整体增幅较为平稳，2023年起案件数量增长较快。
- **从案件类型分布看**，融资租赁类案件占比达58.3%，资管类案件占比为9.7%，票据类案件占比为8.7%。
- **从绿色产业的涉诉主体分布看**，涉风、光、电、储等新能源产业链的案件占比60.8%，涉污染治理、修复等环保产业链的案件占比25.3%，其他主体案件占比13.9%。

- **从案件标的额来看**，浦东法院受理的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总标的额达49.14亿元。其中，涉融资租赁公司案件标的额28.69亿元，涉银行案件标的额14.52亿元，涉证券、信托、基金等资管类案件标的额3.1亿元。

白皮书分析，随着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提速，新类型交易不断出现，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呈现出**案件绝对数量日趋上升、涉诉金融机构多元化、新能源产业链涉诉较多、案件标的额同步增长**等特点。同时，也存在**绿色金融规则体系尚未健全、绿色投资风险管理有待加强、绿色融资合规审查尚需完善、绿色发展创新举措尚待深化**等问题。

为更好落实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与“五大支柱”，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及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建议：**一是政府加强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绿色发展环境；二是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能级，实现与绿色产业发展共赢；三是绿色产业经营主体恪守诚信经营，提升企业绿色综合效益；四是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绿色金融司法服务保障水平。**

### 典型案例

会上，浦东法院发布了**8起涉绿色金融商事审判典型案例**，包括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保理合同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等类型，积极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

例如，在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浦东法院创新运用“示范判决+诉前鉴定+专业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在群体性金融纠纷示范判决生效后，由金融纠纷治理法官工作室引导平行案件当事人开展诉前鉴定并参照示范判决结果进行调解，接续由法官审查调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快速化解群体性绿色金融纠纷，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在另一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则明确了管理人在推介绿色资管产品过程中应当提供真实、完善的尽职调查报告，履行好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切实做到“卖者尽责”，也提醒投资者在投资绿色资管产品时，应打破保本保收益的固有认知，树立“买者自负”意识，正确认识投资风险。



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进一步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行秩序，不断发挥裁判规则引领力，为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司法服务保障。

当天下午，浦东法院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在金茂大厦“浦东法院 陆家嘴金融城 金融纠纷治理法官工作室”联合召开了**绿色金融风险协同治理与司法服务保障研讨会**。会上，与会人员就绿色金融领域的风险协同治理、绿色金融司法服务保障及涉绿色金融商事案件多元化解进行深入交流，以期为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涉绿色金融纠纷商事审判典型案例 2018年-2024年

#### 案例目录

案例一：林某与某证券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绿色资管产品管理人应依法切实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

案例二：刘某与某股份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销售机构在代销绿色基金产品时应尽到谨慎勤勉的审查义务

案例三：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农业科技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绿色发电项目收益可认定为应收账款并作为质押标的

案例四：某融资租赁（中国）公司与黄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绿色融资租赁中承租人非典型违约责任的认定

案例五：某商业保理公司与某电业公司等保理合同纠纷案——具备可期待性和确定性的未来绿色应收账款可叙作保理

案例六：某实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等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以不适格绿色资产开展售后回租的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案例七：某融资租赁公司诉某新能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积极协调化解纠纷促使绿色项目重获新生

案例八：王某等与某证券公司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案——“示范判决+诉前鉴定+专业调解+司法确认”快速化解群体性绿色金融纠纷

## 案例一：林某与某证券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绿色资管产品管理人应依法切实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

### 一、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被告某证券公司发布《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推广设立“A新能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该计划主要投资于某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B新能源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资金主要用于向某生态公司发放绿色信托贷款，补充其流动资金。同年11月，原告林某与被告某证券公司签订《A新能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同时原告林某在《风险揭示书》上签字确认，案涉《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显示原告林某投资风险承受度约为进取型，《适当性评估结果确认书》载明原告林某的风险承受能力为高风险承受能力，案涉资产管理计划符合原告林某拟投资品种。2018年5月，因用资方某生态公司内部重大事件对该公司偿还信托贷款本息产生不确定性，被告某证券公司多次向投资人发布公告进行风险提示，并就信托贷款诉讼等事宜进行公告，向投资者发布关于A新能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无法兑付、无法进行收益分配、到期无法进行份额退出的公告。2019年5月，被告某证券公司以“流动性资金支持”的名义向原告林某支付了投资本金的30%。2020年监管部门分别对被告某证券公司出具两份《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和一份《采取责令改正并暂停资产管理业务措施的决定》，载明被告某证券公司在业务开展中存在夸大宣传、未充分提示风险的问题，基金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性宣传和违反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等情况。2021年5月，法院受理某生态公司重整案件。原告林某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证券公司赔偿剩余的70%投资本金、收益损失，以及对应的利息损失。

### 二、裁判结果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适当性义务是指资管产品管理人及其委托的销售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券商集合理财计划等金融产品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本案中，虽然原告林某在案涉资管产品《风险揭示书》上进行签字确认，但监管部门已明确被告某证券公司针对原告林某存在未有效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并作出相应监管决定，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法院认定被告某证券公司在销售涉案产品时存在未充分了解客户、未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的问题。

据此，被告某证券公司未完全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结合被告某证券公司在涉案产品管理中的其他过错以及原告林某自身行为的欠缺，酌定被告某证券公司对原告林某的投资本金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因被告已向原告支付投资本金30%的金额，故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投资本金的40%。若涉案资产管理计划清算后能够收回款项，原告林某应将收回款项的70%支付给被告某证券公司，且以被告某证券公司赔偿金额为上限。

一审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三、典型意义

根据法律规定，本案被告证券公司作为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同时作为该资产管理计划的销售机构，应尽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责任，确保投资者在充分了解产品内容以及风险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决定，并承受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该证券公司被监管部门认定在销售过程中存在夸大、误导性宣传，对投资者未有效履行适当性义务，导致投资者对被投绿色企业及绿色项目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丧失自主决定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一方面明确了管理人在推介绿色资管产品过程中应当提供真实、完善的尽职调查报告，履行好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切实做到“卖者尽责”；另一方面，投资者在投资绿色资管产品时，也应打破保本保收益的固有认知，树立“买者自负”意识，正确认识投资风险。

## 案例二：刘某与某股份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销售机构在代销绿色基金产品时应尽到谨慎勤勉的审查义务

### 一、基本案情

2017年5月27日，原告刘某经被告某股份公司工作人员推介，签订《某某生态旅游产业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基金合同》），并投资120万元用于申购“某某生态旅游产业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涉案基金）的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为甲基金公司。被告某股份公司在推介期间向刘某提供了甲基金公司关于“某某生态旅游示范镇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等宣传材料。后刘某收到甲基金公司确认函，载明涉案基金于2017年5月31日成立并开始计息，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0%，每半年分配一次收益，基金终止日为2018年11月30日。

2018年7月2日，刘某发现甲基金公司失联，遂向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载明：已受理包括原告刘某在内的六名投资者起诉甲基金公司的案件，涉案基金于2016年11月24日业已成立，投资人名单中仅有一人，为案外人朱某，投资额为500万元，各原告均不在投资人名单中，该基金自成立后即进入封闭期，时长为18个月，未设立开放期，该六案《基金合同》均签订于2017年4月至5月，该期间尚处于涉案基金的封闭期。2018年8月17日，涉案基金因管理人甲基金公司失联，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依法注销。甲基金公司收取投资款的账户并非具备监管功能的私募基金募集账户，而是可以随意支取的一般账户，各原告支付的投资款项未依约投入底层资管计划。该院认为该六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遂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因公安机关未予刑事立案，原告刘某于2023年4月向浦东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认为被告某股份公司在案涉基金销售过程中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投资款本金及相应的收益损失。

## 二、裁判结果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虽然原告起诉基金管理人的案件被法院裁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公安机关尚未刑事立案侦查。结合相关案件长时间未进入实体审理且涉案基金因管理人失联而被注销等客观情况，法院可以认定原告刘某投资涉案基金的损失业已确定。其次，本案《基金合同》签订时涉案基金处于封闭期、合同记载的账户并非具备监管功能的基金募集账户等事实均指向甲基金公司的欺诈缔约行为，而被告某股份公司作为专业的基金销售机构，未能在推介销售过程中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注意及风险告知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其推介销售行为与刘某所受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再次，刘某作为投资者亦未尽到相应的审查、注意义务，应对其盲目轻信行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法院综合考虑前述事实以及各主体在本案投资签约过程中的过错程度，酌定被告某股份公司对原告刘某的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基金销售机构在销售绿色基金产品时应当尽到谨慎勤勉的审查义务。国家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但同时，无论是基金销售机构还是投资者，均应警惕某些基金管理人利用绿色基金项目进行虚假宣传对投资者实施欺诈行为。本案被告作为基金产品的销售方，相较于投资者具有更强的风险甄别能力，其不应仅充当资料的传递者，而应把好绿色投资风险管理的第一道关，对绿色基金是否真实、适销、是否处于封闭期等情况进

行审查，将投资者的风险把控于实际投资之前。此外，投资者自身亦应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所投产品的真实情况，避免盲目轻信高收益宣传。本案的裁判有利于规范绿色基金产品的销售行为，防范假借绿色基金产品套取资金的行为，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案例三：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农业科技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绿色发电项目收益可认定为应收账款并作为质押标的**

#### **一、基本案情**

2021年2月4日，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出租人)与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共同承租人)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及相关附件，约定: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以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的形式向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出租一批沼气发电设备，租赁期限为60个月，自起租日开始计算租赁期限，同时约定了租赁利率和回购价款。同日，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与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签署《质押合同》，约定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以“内蒙古某沼气发电项目&沼气提纯项目中被告某能源科技公司的电费、沼气、有机肥销售等收益权”作为质押标的，并设置特定收款账户，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该质押于2021年3月3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上进行质押登记。《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签订后，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于2021年3月10日向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发放融资款。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自2023年6月21日起逾期未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诉至法院，宣布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提前到期，请求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向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支付全部未付租金、逾期利息、留购价款等款项，并要求实现应收账款质权以清偿上述债务。

#### **二、裁判结果**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质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法成立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



现原告已按约向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支付了案涉租赁物购买价款，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未按约向原告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某农业科技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支付未付租金、逾期利息。关于原告要求行使二被告享有的相应项目电费、沼气、有机肥销售等收益权的质权主张，因上述收益具有可期待性及可确定性，原告的该项主张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 三、典型意义

绿色融资担保方式包括绿色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绿色设备抵押担保、绿色企业不动产抵押担保等。对于绿色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效力判断，一方面，需要对应收账款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即对诸如风力、沼气、水利发电、绿色基站等项目建设中形成的未来应收账款确定其可期待性及可确定性，具体可从绿色项目的应收账款是否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基础交易关系、绿色债权实现的基础条件是否已具备、绿色应收账款是否可以基于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实际履行得以稳定实现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另一方面，要审查绿色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以及出质登记情况，质押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范围及质押担保的范围与出质登记是否一致等。此外，本案裁判亦反映出，对将有的应收账款设立特定收款账户有助于在发生争议时实现应收账款质权，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应收账款未合理识别、未特定化问题，也可直接确定账户内款项优先受偿，从而降低诉讼维权成本。

## 案例四：某融资租赁（中国）公司与黄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绿色融资租赁中承租人非典型违约责任的认定

### 一、基本案情

2022年1月25日，原告某融资租赁(中国)公司与被告黄某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被告黄某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原告融资租赁某新能源汽车一辆，并约定了租赁期限、每期租金、逾期违约金以及出租人的救济途径等内容。



《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第五条“所有权及租赁期满后的处理”第1款约定，租赁期间，租赁车辆无论登记在出租人(原告)或承租人(被告黄某)或承租人指定的第三方名下，租赁车辆的所有权，包括(现在或以后附属于租赁车辆的)所有零部件、替换件、更新件、附件和辅助件的所有权归均属于出租人。在租赁期间内，承租人不得有任何对租赁车辆及其零部件进行销售、抵债、转让、承包、抵押、投资或使其被留置等侵害出租人所有权的行为。第九条“违约和救济”第1款约定，出现以下情形的，视为承租人违约：…(5)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允许发生任何对租赁车辆及其零部件进行销售、抵债、转让、承包、抵押、投资或使其被留置或被有权机构查封、扣押等侵害出租人所有权的行为的。…合同签署后原告某融资租赁(中国)公司依约放款，并将租赁车辆实际交付给被告使用。被告黄某在履约过程中，未经原告同意将案涉租赁物转让给第三方，租赁车辆已办理转移登记，现该车辆登记机动车所有人变更为案外人胡某。

## 二、裁判结果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黄某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法无悖，依法成立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原告依约支付了车辆转让价款，取得了租赁物的所有权，被告也已接收了租赁物并将租赁车辆登记在其名下，应认定原告已履行了其合同义务。该合同第五条第1款、第九条第1款约定，在租赁期间内，承租人不得有任何对租赁车辆及其零部件进行销售、抵债、转让、承包、抵押、投资或使其被留置等侵害出租人所有权的行为，否则视为承租人违约。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赁物的所有权在租赁期限归属于出租人。但是，在租赁期限租赁物由承租人实际占有和使用，一旦承租人将租赁物转让、抵押质押、投资入股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将会对出租人的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权的实现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可能发生受让人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情况。如此，出租人租金债权的物权保障也消失殆尽。被告黄某违反合同约定，未经原告允许即转让案涉租赁车辆，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宣布租金加速到期，并要求被告支付全部到期租金、未到期租金、逾期违约金、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故法院判决被告黄某支付原告全部未付租金、留购价款及相应的逾期违约金。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的方向转型。融资租赁企业在支持个人及中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提升新能源汽车普及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以新能源汽车为租赁物的业务开展过程中，租赁物的转移风险亦不可忽视。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承租人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一旦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让给他人，则不仅违反了承租人不得擅自处分租赁物的约定，也会对租赁物的担保功能产生严重损害相较于逾期支付租金等常见违约情况，该行为属于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非典型违约情形。对此，法院应综合承租人违约行为的性质、严重程度，以及出租人权利受损的情况，依法保障金融机构依约行使合同权利。在相应条款不存在无效事由的情形下，应尊重各方约定，出租人可根据合同约定主张租金加速到期或解除合同。

### 案例五：某商业保理公司与某电业公司等保理合同纠纷案——具备可期待性和确定性的未来绿色应收账款可叙作保理

####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16日，被告某电业公司（售电方）与案外人某供电公司（购电方）签订水力发电相关《购售电合同》。2021年9月6日，原告某商业保理公司与被告某电业公司签订《保理合同》（适用于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分别对保理融资款及应收账款回收、反转让等情形及违约责任作出约定。同日，被告某电业公司提交《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将其与某供电公司之间签订的前述购售电合同及后续签署的相关合同项下自2021年9月起未来5年内所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以及该应收账款上所从属的一切从权利和权益，转让给原告某商业保理公司，上述应收账款转让（保理）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登记。原告某商业保理公司与被告某电业公司办理了共管账户，作为涉案保理融资的回款专户。嗣后，原告某商业保理公司依约向共管账户交付保理融资款。自2022年1月起，被告某电业公司在尚未按期补足保证金的情况下，从共管账户支取电费，并自2022年9月29日之后停止了原告对共管账户的权限，之后再无新的还款。原告某商业保理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电业公司回购应收账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二、裁判结果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本案中，被告某电业公司与某供电公司签订水利发电相关《购售电合同》，某供电公司向被告某电业公司购电并支付电费，且涉案保理合同签订时该《购售电合同》仍处于正常履行中，案涉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原告某商业保理公司在签约前对购售电合同及此前10个月的购电结算清单及电费支付流水均进行了审查，融资款与应收账款金额尚属匹配。根据当时购售电合同的履行情况及水电站发电业务的长期性，双方对未来5年将有的电费收入具有合理的可期待性和确定性，符合未来应收账款保理要求。综上，认定原告某商业保理公司与被告某电业公司之间成立保理合同法律关系被告某电业公司擅自支出保理回款专户的款项，且在收回原告某商业保理公司对共管账户的管理权限后亦未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应还款项，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判决被告某电业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回购款、逾期费和律师费。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 三、典型意义

随着绿色金融的创新发展，风电、水电等未来绿色收益作为保理融资的基础资产开始受到关注，绿色应收账款的确定性和可期待性则成为其能否叙作保理的主要争议焦点。本案裁判明确，应收账款真实存在，且保理人审查了企业过往一定期间的电费支付票据、资金流水、交易合同等，可以证明其电费收益稳定且持续产生，应当认定对案涉应收账款进行保理融资存在合理可期待性和相对确定性，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保理关系。本案在确认绿色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模式的同时，也明确金融机构在开展此类业务时，须严格核查绿色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未来现金流的稳定性，为保理商、融资企业以及最终债务人等市场主体提供了法律预期和权益保障，鼓励金融机构在合规的框架下开发更多符合绿色标准的融资工具，为绿色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创新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 案例六：某实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等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以不适格绿色资产开展售后回租的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 一、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原告某实业公司与被告某投资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原告某实业公司向被告某投资公司购买租赁物件并回租给被告某投资公司使用，合同附件《转让租赁物件清单》载明租赁物为某国家森林公园打包资产包括林地、雪场、机器设备等流动资产以及公园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并有《资产评估报告》对某森林公园资产包明细及价值进行评估。合同对融资金额、租金总额、服务费及各期租金作出约定，同时约定如被告某投资公司迟延付款则自租金到期之日起，每日按所欠逾期租金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被告某交通集团公司作为被告某投资公司的母公司，为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原告某实业公司向被告某投资公司支付融资款，被告某投资公司支付部分期数租金及服务费用后，剩余租金未支付。原告某实业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投资公司支付剩余租金及按照合同约定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要求被告某交通集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二、裁判结果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可作为融资租赁标的的资产一般应具备可流通、可特定化、非消耗物、权属明晰等法律特征，案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物为某国家森林公园的打包资产，资产包含流动资产(存货)、非流动资产(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从资产属性看，案涉某森林公园资产包整体属于不适格的租赁物。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兼具融资与融物双重属性，以不适格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的，不宜认定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结合案件事实，本案应按照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原告收取的高额服务费因不能证明其提供了相应服务，变相增加企业隐性融资成本，属于砍头息性质，故扣除服务费后，应依照原告借款数额、时间及被告某投资公司还款数额时间，依照实际年利率计算得出被告某投资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据此，判决被告某投资公司向原告某实业公司承担还本付息义务。

### 三、典型意义

租赁物是融资租赁交易的核心，融资租赁企业在开展绿色融资租赁业务时应高度重视对绿色租赁物适格性的审查，若所涉绿色资产本身不适宜作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亦难以成立。一方面，融资租赁的业务模式与绿色产业资产价值高、回报周期长的融资需求相适应，融资租赁产业应加大对绿色转型发展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绿色产业中的碳资产、生态资源等新型资产类型是否符合融资租赁标的物要求，则需要市场主体在开展业务时着重审查。绿色融资租赁租赁物的适格性可以通过租赁物是否具备可流通、可特定化、非消耗物、权属明晰等基本特征进行确定，如本案中所涉租赁物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且难以分制，资产具有较强公益属性，而产生收益的功能属性偏弱，亦难以在市场进行流转并确认价值，在此情形下不适宜作为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的租赁物。对于已基于不适格租赁物开展的绿色融资租赁业务，应依据实际形成的法律关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 案例七：某融资租赁公司诉某新能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积极协调化解纠纷促使绿色项目重获新生

#### 一、基本案情

2022年6月27日，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与被告某新能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约定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向被告某新能源公司购买某风电项目项下风电机组设备，并回租给被告某新能源公司使用，同时约定了租赁期限、租金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第15.1条还约定：“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即视为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违约：……(7)承租人关闭、停业、歇业、停产、重组、合并、分立、自行提出清算或破产申请、被申请进入破产重整程序/预重整程序/破产清算程序/破产和解程序、被接管或托管、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或类似情况，或已开始磋商安排此类事项或有关部门就上述事项作出批准或决定；……(17)承租人经营、管理或财务等状态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发生其他任何重大事件或情况，出租人认为可能影响承租人经营能力、清偿能力或履行本合同的能力的。”后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并交付租赁物。2022年10月31日，被告某新能源公司主动向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发出的《通知函》称，因项目未取得土地审批手续而被当地政府责令停工，存在无法建成并网风险，决定于2022年11月1日停止项目工作。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认为被告某新能源公司作为承租人发生该等重大事件，严重影响到承租人经营能力、清偿能力和履行租赁合同的能力，足以认定承租人已经构成租赁合同项下违约，故诉至



法院，宣布本合同项下所有未到期应付款项加速到期，要求承租人立即支付本合同下的所有到期和未到期租金、租赁物留购价款、迟延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项。

## 二、审理过程

本案审理中，浦东法院了解到涉案风力发电项目及配套储能项目系一项重大绿色环保项目，对促进当地风能利用、风电产业聚集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由于土地审批手续暂未能完备导致暂停施工，目前被告某新能源公司以及其股东被告某低碳投资公司、某能源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协调各方，主动接洽相关主管部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已经要求持续督促涉案项目加快建设，项目复工启动在即。若原告坚持要求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加速到期，可能会导致被告某新能源公司短期内面临着巨额还款压力，整个项目将无法正常运转，企业生存也将面临重大挑战。为此，本案承办法官积极联络当事人以及当地有关部门，沟通协调本案调解方案。经过数轮艰苦的沟通协商，被告某新能源公司的关联公司最终同意为该公司履行调解方案的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回购担保责任，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也主动调整履行租金期限，豁免了迟延违约金。在浦东法院的主持下，各方签订了调解协议，妥善化解了本案纠纷。

## 三、典型意义

当前，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行动目标。绿色发展并非仅关注经济效益，而是要努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形成投资者获得合理收益、优质绿色企业匹配优质金融资源、绿色发展提升社会公共利益的良性发展循环。然而，在绿色发展项目推进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类风险挑战。本案中，企业由于对绿色项目经营风险估计不足和对土地利用政策掌握不全，融资人风电项目被当地政府责令停工，存在无法建成并网的风险，导致绿色项目未能有效开展，进而形成违约。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东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中，坚持综合考虑金融机构的经济效益和绿色项目的社会效益，积极推进矛盾纠纷的协调化解。为挽救该绿色项目和绿色企业，浦东法院积极联络协调各方当事人通过案外人担保以及履行期限调整的方式最终达成调解方案，促成案涉新能源纠纷矛盾化解，一方面为金融机构债权实现提供更多保障，解除债权人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为债务人解除暂时的困境、促进案涉风电新能源项目施工争取了宝贵时间。

## 案例八：王某等与某证券公司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案——“示范判决+诉前鉴定+专业调解+司法确认”快速化解群体性绿色金融纠纷

### 一、基本案情

2017年2月13日，申请人某证券公司发布《某证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公告》，推广涉案资管计划，并在集合计划投资范围中载明，该计划投资标的是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设立的“某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用于向某环保股份公司发放绿色信托贷款，资金用于补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项目营运资金。2017年2月23日，涉案资管计划于成立，资管计划管理人为申请人某证券公司。某环保股份公司经营围绕垃圾焚烧处理展开，主要从事环保设备销售、垃圾发电、工程建设，为补充营运资金，需要进行融资。2017年1月26日起，某环保股份公司多次发布公告，载明业绩(或预计业绩)同向下降；2018年4月2日起，某环保股份公司多次发布公告，载明某环保股份公司及相关公司涉及多起诉讼，存在股权被冻结事项。经申请人某证券公司指示，信托公司宣布某环保股份公司在《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信托贷款于2018年5月21日全部到期。后，申请人某证券公司对该环保股份公司提起诉讼。2018年6月29日，申请人某证券公司向投资者发布《公告》，确认在涉案资管计划投资的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贷款已于2018年5月21日提前终止，根据《资管合同》约定，涉案资管计划于2018年5月21日提前终止。投资者诉至法院要求某证券公司赔偿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损失。

### 二、处理经过

浦东法院选择原告满某诉被告某证券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作为示范案件，其他案件作为平行案件。示范案件经审理后，确认被告某证券公司在该案中尽到适当性义务，但违反了《资管合同》项下管理人应尽的谨慎勤勉的管理义务，应对投资人的投资本金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同时，示范案件在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时，确认了若某证券公司未尽到适当性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一审判决后，示范案件被告某证券公司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鉴于投资者在投资时是否签署合同、风险测评文件等，将对判断申请人某证券公司是否尽到适当性义务具有重要作用，并对申请人某证券公司承担责任比例产生影响，平行案件的顺利调解需要以笔迹鉴定为前提。



为此，浦东法院积极创新诉前鉴定机制，在平行案件委派至调解机构进行调解时，指导调解员询问当事人对于涉案合同文件签名真实性是否认可。本案调解过程中投资人王某对签名真实性存疑，经当事人同意，由法官指导调解员组织双方对笔迹鉴定的检材、样本以及原件等材料进行质证，再将相关材料交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待鉴定结果出具后，调解员根据鉴定结果，分别参照示范判决确定的有无尽到适当性义务时证券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调解，并最终形成调解协议。此外，本案中投资人王某对调解协议的履行存在较大疑虑，法院引导当事人就诉前调解阶段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后法院经书面审查裁定确认双方调解协议有效。

### 三、典型意义

浦东法院不断探索完善群体性纠纷示范判决机制，形成“示范判决+诉前鉴定+专业调解+司法确认”新模式快速化解群体性绿色金融纠纷，服务保障绿色金融健康发展。在群体性金融纠纷示范案件生效后，对于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其他平行案件，引导当事人参照示范判决的结果，选择适当的调解机构组织调解，创新平行案件诉调先行鉴定机制，并及时满足平行案件调解协议司法确认需求，高效化解群体性金融纠纷。针对案涉某证券公司绿色资管产品系列群体性纠纷，浦东法院已委托、委派调解成功102件，既确保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又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和时间成本，提升了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实现了“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 国务院：厦门小额诉讼案件诉讼费按四分之一标准交纳

来源：国务院 发布时间：2024年10月3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10/content\\_6979078.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10/content_6979078.htm)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厦门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国函

[2024] 149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

你们关于在厦门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支持厦门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同意自即日起2年内，在厦门市暂时调整实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目录附后）。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相关省市人民政府要根据上述调整，及时对本部门、本省市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相应调整，建立健全与厦门综合改革试点任务相适应的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制度。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方面密切跟踪综合改革试点进展，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评估，在相关试点任务结束前及时商司法部研提后续工作建议。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按程序修改完善有关行政法规；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规定。

国务院将根据厦门综合改革试点情况，适时对批复内容进行调整。

附件：国务院决定在厦门市暂时调整实施的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目录

国务院

2024年10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 附件

序号	有关行政法规规定	调整实施情况
1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十六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	在厦门审理的小额诉讼案件诉讼费用标准，在简易程序基础上再次减半，按照民事案件受理费标准的四分之一交纳。
2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 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单位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	授权厦门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办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 关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法官这样说

来源：上海一中院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4年10月09日 09:02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从法官职权主义逐步转向当事人主义，**谁主张、谁举证成为民事诉讼活动遵循的基本举证原则**。为弥补此原则下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对案件裁判结果的影响，《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司法实践中，亦允许律师在符合规定条件情形下持调查令收集证据。

准确把握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与申请调查令的条件，避开常见误区，提高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的成功率，对于发挥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制度效用，保障案件公平公正审理，提升案件审判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 01 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与申请调查令的区别与联系

**法院调查取证**，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符合法定情形下由法院进行调查收集证据的一种证据收集方式，其又分为依职权调查与依申请调查。**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具体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6条第1款所列的五种情形，即：

- 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 涉及身份关系的;
- 涉及《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诉讼的;
- 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 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除此之外，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调查令是指当事人在立案审查阶段、民事诉讼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诉讼所需要的证据**，经申请并获法院批准，由法院签发给当事人的诉讼代理律师，由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所需证据，或申请执行人在执行阶段因无法获取相关证据履行相应举证责任，经申请由法院批准签发的供指定律师向有关单位调查收集特定证据的法律文书。

不同于法院调查取证制度，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目前尚未被纳入立法层面，主要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院或部分中院的地方司法文件进行规制。**其与法院调查取证在实践适用上主要存在如下区别与联系：**

1.调查令制度是当事人自行调查取证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法定证据收集方式的补充，其通过法院权利背书的方式，赋予持令调查人在调查收集证据时一定的强制性既弥补了自行调查取证的不足，也缓解了法院审判压力。

2.在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情况下，如所需调取证据属于持调查令可调取范围，当事人申请法院进行调查的，一般不予准许，释明通过申请调查令方式进行取证；如所需调取证据不属于调查令调取范围且符合法院调查取证条件的，由法院进行调查取证。

3.调查令的申请与使用，应遵循案件受理法院所适用的地方性调查令司法文件规定存在不当行为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涉及地方性调查令司法文件未规定情形的，可参照适用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相关规定。

## 02 民事诉讼中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的常见误区与应对

### 1.申请调查条件把握存误解

误区

- 对于自身举证能力范围内的证据，申请法院调查
- 对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的理由不作说明
- 所申请调取证据与讼争事项无关，与在审案件无关联性
- 为其他案件诉讼需要，在本案中申请调取证据
- 应申请调查令却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应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却申请调查令

厘清:

**法院调查取证的前提**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相关证据。当事人自身举证能力范围内的证据，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范围。

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与讼争事项具有关联性，无关联或不影响在审案件处理的法院不予准许。

法院调查取证制度、调查令制度各有其制度功能及适用范围，应予遵从。

应对:

- 充分发挥自身举证能力，穷尽自行取证方式。
- 详细说明所需调取证据与讼争事项的关联性与必要性。
- 查核了解案件受理法院所适用地方性司法文件对调查令签发条件的规定，必要时向被调查人核实其处可接受的协助调查方式。

各地方司法文件对于不属于调查令调取之证据范围的规定不一，所列举情形有：

涉及国家秘密的；涉及个人隐私的；涉及商业秘密的；证人证言；法院生效案件卷宗材料；仲裁案件卷宗材料；公安机关尚在侦查或者撤销的刑事案件材料；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中获得的行动轨迹、住宿记录等个人信息，但已经在其他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的除外；破产申请审查阶段被申请人的财产、债权债务状况；已经向社会公开的政府信息或者其他信息；其他不宜以调查令形式调查取证的情形。

**关于银行交易记录，不同银行要求不同**，部分允许持调查令调查，部分仍要求由法院进行调查取证。

**关于社保缴纳信息，不同省市操作方式不一**。目前本市社保管理中心基于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一般仅接受法院实地或发函进行调查取证

## 2. 申请调查对象指向有偏差

误区：

- 申请法院向对方当事人调取书证
- 申请调查令向对方当事人调取书证

厘清：

《民诉法解释》第112-11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5-48条规定有书证的证明妨害规则，也即**书证提出命令**。依据相关规则，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法院经审查，申请理由成立的，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不论是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还是申请调查令，均系向被调查人调取证据，在申请人要求调取书证的被调查人为对方当事人的情况下，**书证提出命令已可起到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制度的作用**。

应对：

- 如所需证据为书证且由对方当事人控制掌握的，可申请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相关书证，并充分说明相关书证与讼争事项的关联性、必要性。
- 如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掌握相关书证的，尽力提供对方当事人控制掌握相关书证的证据。

## 3. 调查申请内容表述欠规范

误区：

- 所提供被调查人的姓名、名称等信息不准确
- 对于所申请调取证据的具体范围不明确或用“案件相关材料”等概括性表述未写明持令人信息或不完整



厘清：

被调查人的姓名或名称、所需调查收集证据的名称及具体范围是法院调查取证或持调查令收集证据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和前提，持令人信息更是法院开具调查令的必要前提，应当明晰、完整、准确。

应对：

- 提交申请前仔细核对被调查人的姓名、名称。如不确定的，先行向被调查人核实。如所需证据涉及微信、支付宝、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信息记录的，目前已有微信推文汇总相关平台公司名称及注意事项，可检索查知。
- 详细列明所需调取证据的名称及具体范围。如涉及银行交易记录的，注明相应期间，并根据举证需要进一步明确交易对手、备注、摘要、具体交易时间等信息范围；涉及档案材料的，明确所需具体材料名称；涉及社保、公积金的，根据需要明确参保单位名称、缴费标准、提取时间等信息范围，并写明所涉参保人的身份证号码；等。
- 按要求写明持令人的姓名、所在律所、执业证号等基本信息

### 03 民事诉讼中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的其他注意事项

1.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民事诉讼中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调查令，**一般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20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对于调查令的申请，各地方性司法文件规定不一，既有要求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一定期限内提出，也有规定在法庭辩论结束前申请，可按照案件受理法院所适用司法文件执行。

逾期申请法院调查或调查令的，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68条第2款、《民诉法解释》第101条、102条处理。

2. 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查令前，除按常理应由被调查人持有、保管相关证据的，一般应向被调查人核实其处有无所需调取证据。

法院调查收集提供证据、持令人凭调查令收集证据，以被调查人持有、保管所调查证据为前提。为减少不必要讼累，如被调查人处有无相关证据存在不确定性的，应先行核实。

3. 申请调查令，应提交申请书、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或法律援助公函、代理律师的有效执业证书。部分地方性调查令司法文件规定需要提供调查令使用承诺书、保密承诺书的，按要求提交。

对于申请调查令时持令人即执业律师的人数，因《民诉法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实践中多参照该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供两名执业律师信息。部分地方性调查令司法文件也允许一名律师或由实习律师作为随行人员持令调查。

本市现可申请电子调查令，途径：

- **PC端**，通过电脑浏览器搜索“上海法院诉讼服务网”或直接输入海法院诉讼服务网网址<http://www.hshfy.sh.cn/shwfy/ssfww/>，登录律师平台后，进入“调查收集证据”，按要求填写信息提交申请；
- **移动端**，微信搜索“上海法院12368”公众号，进入“诉讼服务—律师—调查令”，按要求填写信息提交申请。

4. 调查令存在有效期限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失效。调查令持令人因故未使用调查令或被调查人不能提供证据时，应当在受理案件法院所适用地方性司法文件规定期限内，将纸质调查令及被调查人不能提供证据的书面说明一并交还法院，以归入案卷。如系电子调查令的，持令人亦须在规定期限内向调查令签发法院反馈相关情况。

5. 持令人在使用调查令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的，将根据情节轻重承担相应责任。

各地方调查令司法文件规定的不当行为包括：

- 伪造、变造调查令的；
- 持伪造、变造的调查令调查收集证据的；
- 伪造、变造、隐匿或者毁灭持调查令调查收集到的证据的；
- 擅自复制、泄露、散布持律师调查令收集的证据的；
- 利用持律师调查令调查收集到的证据对案件进行歪曲、失实、误导性宣传，影响案件办理的；
- 利用持律师调查令收集的证据诋毁对方当事人声誉的；
- 未经法院允许私自拆封被调查人密封的调查证据的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提交调查收集的全部证据、调查令或回执的其他不当使用调查令或滥用调查证据的情形。

相关责任包括：

- 在一定期限内或在该案中不再向持令人签发调查令；
- 由法院向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提出司法建议，对持令人予以处罚或惩戒；
- 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此外，律师事务所未尽到管理义务导致律师出现上述情形的，法院可以建议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给予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

获准共同参与调查的人员存在不当使用调查令或者滥用调查证据行为的，可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或者司法拘留，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6.被调查人的权利义务

- 对于依规出具的调查令指定调查内容以外的事项，有权拒绝。
- 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妨碍持令律师调查取证的，依据各地方调查令司法文件，可能承担的责任包括：
  - 责令履行协助义务；
  - 视情节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予以处罚。

## 04 立案审查阶段、执行阶段申请调查令的特别注意事项

1.当事人在立案审查阶段申请调查令的范围仅限于法院能否立案的程序性证据，如所需调查收集的证据涉及实体问题的，应在立案后向审判庭申请。

程序性证据主要包括：

- 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情况；
- 法院对涉诉纠纷管辖权情况；
- 其他需要开具调查令调查的证据。

存在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其他不宜由诉讼代理律师凭调查令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不予签发调查令。

2.执行阶段调查令适用于被执行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的证据的调查收集，包括：

- 被执行人的基本情况；
- 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
- 被执行人是否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以及第三人的财产情况；
- 能够证明被执行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的其他情况。

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与执行案件无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由人民法院执行人员调查收集或其他不宜持令调查的证据，不得使用调查令。

##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 类案裁判方法

来源：上海一中院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年05月15日 19:46

**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不当得利纠纷诉讼旨在调节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恢复民事主体之间特定情形下所发生的非正常利益变动，属于对已发生财产变动的撤销。《民法典》设专章对不当得利作出规定，但对如何处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其他请求权之间的关系、举证责任分配等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适法不统一的情形。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进行梳理、提炼和总结。

### 目录

- 01 典型案例
- 02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审理难点
- 03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 0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01 典型案例

#### 案例一：涉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关系的认定

李某将50万元汇入张某名下的银行账户，后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偿还50万元借款及利息。因张某否认借款，李某亦无证据证明其与张某存在借贷合意，法院遂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李某又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张某返还50万元款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张某收款无法律根据。张某辩称，该款项系李某偿还对其的借款，并非无法律根据，不构成不当得利。

### 案例二：涉及“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

陈某将5万元转入薛某账户，后将薛某诉至法院，要求薛某归还不当得利5万元。审理中，陈某主张在转账时误将账号中两位数字颠倒，导致5万元转入薛某的账户。薛某则辩称，陈某系代他人向其退还货款，故薛某不构成不当得利。同时，薛某主张关于收受款项“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应归于陈某。

### 案例三：涉及得利人返还范围的认定

梁某在甲公司务工时受伤，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甲公司赔偿梁某10万元。由于甲公司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实际向梁某支付17万元，但此时双方均未发现多转账的事实。后甲公司经对账发现多转帐7万元，遂与梁某协商返还，但遭梁某拒绝。甲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梁某返还不当得利7万元及款项支付之日起算的利息。梁某认为多转款项系因甲公司疏忽导致，其并无占有7万元款项的主观恶意，不应承担利息的返还义务，即便承担利息，也应当从甲公司催讨之日起算利息。

## 02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审理难点

### （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认定难

由于不当得利通常伴随基础法律关系发生，常出现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同时存在的情形。对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学理上存在竞合说和辅助说两种观点，对于当事人是否可以同时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其他债权或者物权请求权存在分歧。

由于《民法典》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部分当事人将不当得利作为诉讼策略，在其他请求权被否定后通过不当得利救济，或者为规避举证责任而故意隐瞒基础关系直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法院如何处理上述情形尚存在争议；对于不当得利与其他救济程序如何衔接，尚需要进一步明确。



## （二）关于“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难

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主要争议之一为“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而举证责任分配给何方当事人往往决定案件败诉结果由谁承担。**实践中对此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无法律根据”属于消极事实，主张消极事实的一方，不负证明责任，故应由得利人就其所获利益具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应倒置。**第三种观点认为**，主张不当得利一方一般应当就“无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即法院应当根据不当得利的不同类型，进一步分析确定举证责任分配。

## （三）得利人返还范围的认定难

**从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分析，不当得利不在于填补损害，而在于得利人返还其无法律根据而取得的利益。**

通说认为，不当得利中善意得利人与恶意得利人的返还义务范围不同，因此得利人善意与否的认定往往直接决定得利人需要返还利益的多寡。由于得利人善意与否是对得利人主观认知状态的评判，通常需要结合得利人认知水平、得利人占有利益是否基于可信赖表象事实等进行综合判断，难以形成客观明了的认定标准，故对于得利人返还义务范围的认定标准有待进一步明确。此外，返还义务范围是否因恶意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获利无法律根据的时间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标的物灭失或者转让的情形下得利人的返还义务范围又如何认定等，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争议。

## 03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法院审理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应秉持三项原则：**一是合法性原则**，应严格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二是合理性原则**，应充分平衡受损人与得利人的权益，区分不当得利的不同类型，根据个案情况公平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并确定责任范围。**三是独立性原则**，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属于独立的债权请求权，应严格依照其排除情形和构成要件认定不当得利成立与否。



具体而言，在处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关系中，在两者发生竞合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如当事人选择以不当得利起诉，则法院可遵循以下步骤审理：首先，审查当事人诉求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或者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其次，审查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排除情形；再次，判断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进而认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最后，如果构成不当得利，则进一步确定得利人返还义务的范围。

### （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关系的认定

#### 1.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

不当得利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系独立的债的发生原因，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视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缺乏证据时的兜底请求权基础。

虽然《民法典》对于不当得利与其他请求权关系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立法模式、除外情形、返还范围、第三人返还等规则可以判断，《民法典》总体以支持权利竞合为主。在法律未明文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情形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可与其他请求权发生竞合。

如，合同撤销或解除情形下的利益返还、双务合同中一方履行不能但已获利益的返还，属于合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

又如，侵权人未经受损人同意，处分受损人的财产而取得利益，属于侵权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

**再如**，在得利人已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的情况下，受损人可基于原物返还请求权直接追索该物，也可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原物返还请求权的竞合。

由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在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同，**当事人有权根据己方意愿在法律权限内行使相关权利，选择请求权基础。**

## 2.先诉其他请求权败诉后再诉不当得利的处理

司法实践中，部分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当事人先诉其他请求权败诉后，又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由于其他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不同，法院审理案件的重点亦不尽相同。**一方面**，不宜基于受损人先诉败诉的结果，作出不利于受损人的预先判断。**另一方面**，受损人在前案中对涉案利益主张的法律关系被生效判决否定，只能证明双方之间不成立前案所诉的法律关系，不能当然得出得利人获得利益无法律根据的结论，更不能因此认定受损人已完成“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法院应当根据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及排除情形，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举证责任分配，作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认定。

**如案例一中**，李某在借贷诉讼中因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而败诉，但不当得利诉讼中借款合意并非构成要件，故李某再诉不当得利并不必然败诉。然而，无论是否存在前案借贷诉讼，李某提起不当得利诉讼，都应当对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该案中李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某取得款项无法律根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相反，张某认为系争款项是李某归还对其的借款，且提供了其对李某在前的转账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对李某存在债权。因此，李某要求张某归还不当得利，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法院未予支持。

## （二）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程序审查要点

### 1.审查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

**由于不当得利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可能存在涉及行政管理、刑事追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执行程序而导致的不当得利。**

因此，在审理不当得利纠纷时，需要准确审查财产利益发生变动的原因，判断当事人的诉求是必须在其他程序中解决，还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由其他程序如行政诉讼、刑事退赔等救济，则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通过其他程序救济。

**例如**，受损人因受到诈骗而向得利人转账200万元，得利人被刑事判决认定为诈骗罪并责令退赔，则受损人应当通过刑事退赔的方式寻求救济，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属于救济程序不当。

## 2. 审查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人与相对人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主体包括得利人和受损人**。若财产的流转中有第三人介入，则可能构成多人关系的不当得利。典型情况如指示给付关系下的不当得利：

**如**，指示人与领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效或者被撤销，造成指示行为欠缺法律基础，致使指示人对领取人产生不当得利请求权；

**又如**，指示人与被指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效或者被撤销，致使被指示人对指示人产生不当得利请求权。

在处理多人关系的不当得利时，首先应判断何人对何人的给付欠缺给付目的，则该两者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瑕疵，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请求权人及相对人。

在特殊情形下，应当允许受损人直接向第三人进行追偿。根据《民法典》第986条规定，得利人不知道其所取得的利益无法律根据，且又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的，因得利人所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对受损人不再承担返还利益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988条规定，第三人因得利人的无偿转让行为而间接取得利益的，受损人可请求第三人返还不当得利，此时第三人成为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主体。该情形下，受损人与第三人之间外观上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上述规定实质上穿透两重法律关系，直接赋予受损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请求权基础**。

在涉及多人关系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如果原告仅起诉一方主体，为查明案件事实、厘清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必要时可以追加相关法律主体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 3. 审查原告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是否恰当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与其主张的事实相对应。如当事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法院经审查发现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当事人主张不一致的情形，应当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规定，将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必要时引导当事人变更其诉讼请求。

需要注意的是，释明时应做到程序公开透明、态度客观中立，且要把握释明的限度。**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应当准许；如当事人坚持原诉讼请求，则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4.审查提起不当得利纠纷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有时会就同一事实提起包括不当得利诉讼在内的前后多起诉讼。对于提起不当得利纠纷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法院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7条规定进行审查，即需要同时满足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三个条件。

一般情形下，当事人先诉民间借贷纠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等诉讼，撤诉或者败诉后又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由于两诉涉及的诉讼请求不同，后诉不当得利不构成重复起诉。然而，如果前诉案件中，法院已对当事人提起不当得利的事实作出实体判断或者作为裁判依据，后诉不当得利实质是为了否定前诉的结果，则构成重复起诉。

**例如**，当事人先诉民间借贷经调解结案，后又诉不当得利，由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金额已经在前诉中调解解决，后诉实质为了否定前诉的处理结果，则构成重复起诉。如果属于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 （三）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实体审查要点

#### 1.不当得利排除情形的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985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则一般认定得利人不构成不当得利：

##### （1）给付系履行道德义务

得利人取得的利益如果符合社会一般道德观念，则可排除不当得利的返还。判断是否构成基于道德义务的给付，应结合社会一般道德观念、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给付标的物的价值等情形确定。履行道德义务的典型情况包括向实施救助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对介绍婚姻的非职业介绍人支付报酬、后顺位扶养义务人为扶养而给付费用等。



## （2）清偿未到期的债务

未到期的债务本身属于客观存在的债务，债权人受领未到期债权的清偿，对于债权人而言不存在财产利益的增加，且债权人的受领行为系基于双方的合法债权债务关系，具有法律依据。因此，债权人取得债务人提前清偿的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

## （3）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债务清偿

受损人明知其无给付义务而向他人给付，属于当事人处分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然而，附有条件的给付，给付行为本身不以给付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或者给付时主观上不知其无给付义务等情形，仍成立不当得利。

## 2. 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审查

根据《民法典》第122条规定，是否满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可从两方面进行审查：一是有无法律依据；二是一方获利致使他方受损。

### （1）无法律依据

不当得利与其他请求权之间常常存在竞合，导致“无法律依据”的认定成为一大难点。通说认为应当以欠缺给付目的作为判断标准，即“无法律依据”是指得利人占有利益缺乏根据。因此，得利人和受损人之间即便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也不必然得出得利人占有利益有法律依据的结论，也不能仅以得利人对标的存在法律上的权利就直接认定不构成不当得利，还需要进一步查明得利人的权利范围。

**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依据”主要表现为给付目的欠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给付目的自始欠缺**，即得利人在获得他人给付时无法律上的原因或者给付的原因自始未成立或无效、被撤销，例如依据买卖合同交付物品而买卖合同未成立，或者债务人不知所欠债务已经清偿而进行债务履行或者错误地偿还他人债务等。

**二是给付目的嗣后消失**，即得利人获得给付时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但是完成给付后该原因灭失。

**例如**，附解除条件或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当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届满时效力灭失；依双方当事人共同意志而使合同解除等。



**三是给付目的不达**，即受损人以达到某种意图而进行给付，但得利人受领利益后，受损人的给付目的并未达成。

例如，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嫁妆或彩礼但并未登记结婚，或虽登记结婚但实际未共同生活，后双方离婚。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无法律根据”的认定因其产生原因区分为以下五种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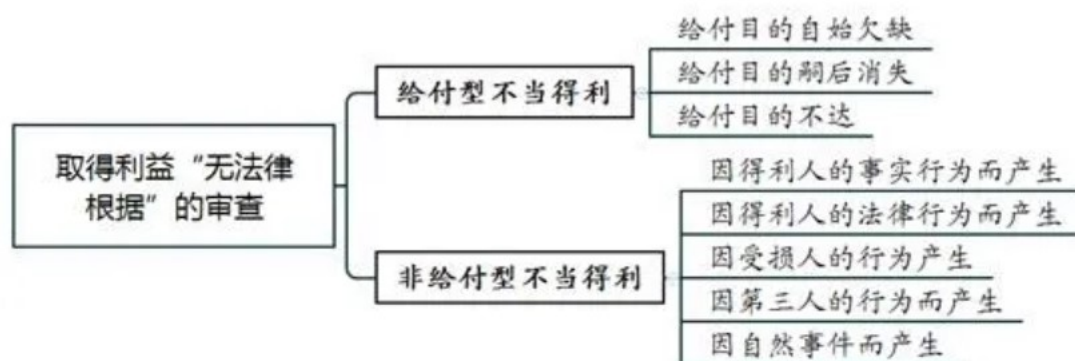
**一是因得利人的事实行为而产生**，如得利人未经他人同意占有、使用他人财产或侵害他人权益而得利。

**二是因得利人的法律行为而产生**，如得利人基于强制执行获得利益，后因执行依据被撤销，受损人可请求得利人返还不当得利。

**三是因受损人的行为产生**，如受损人误认为得利人财产为自己财产，而对其加工导致该财产价值的增加。

**四是因第三人的行为而产生**，如第三人将受损人的肥料施予得利人的土地，此时得利人因第三人的行为获得了本应属于受损人的肥料，构成不当得利。

**五是因自然事件而产生**，如他人所有的家畜因非人为原因进入得利人住所而为得利人所占有。



## （2）一方获得利益并致他方受损

一方获得利益，既包括财产的积极增加，也包括财产的消极增加。财产积极增加是指财产本不应增加而增加，又包括权利的增加或义务的消失。前者如物权、知识产权的取得等，后者如权利负担的涤除、债务免除或减少等。财产消极增加是指财产本应减少却未减少所产生的利益，如本应支出的费用未支出，本应负担的债务而未负担。**致使他方受损既包括财产的积极减少，也包括财产的消极减少。**财产的积极减少是指现存财产的减少，即财产不应减少而因不当得利事件减少，财产的消极减少则是指财产本应增加而因不当得利事件未增加。一方获得利益与另一方承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益必然有他方的损失作为一个对等关系，如果一方获得的利益并不损害他方的合法利益，则不构成法律上的不当得利。

## 3.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审理中，对于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承受损失、损失和获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属于对积极事实的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般由提起诉讼的受损人承担举证责任。

### （1）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

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受损人系使案涉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其最初给付时具有明确的给付目的，应当对其给付目的消失的缘由有相当了解，并对得利人获得利益“无法律根据”的原因有一定的认知。“无法律根据”不是单纯的消极事实，受损人应当能够对欠缺给付目的的具体原因进行说明，**故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应由受损人对“无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

受损人需要举证证明的事项包括受损人原本给付的初始目的、给付目的为何消失或者未实现、受损人与得利人之间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等。具体而言，在给付对象错误的情形中，受损人需要举证证明与得利人素无往来，因而欠缺给付原因；或是提供正确的收款人信息、描述汇款操作时的具体情形等，证明给付原因的确不存在。而在给付对象明确的情形中，受损人需要举证证明其基于特定的基础法律关系作出给付行为，之后该法律关系又发生某种变化，从而导致“无法律根据”，该要件的证明内容同样具体、特定，不存在难以证明的困境。

**对于受损人而言**，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不仅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也不违背举证的便利性和公平性。**对于得利人而言**，无论其占有利益是基于占有公示还是登记公示，其对标的物享有的权利，都应当受权利正确性推定原则的保护。如果仅因被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就要求财产所有人对自己财产获得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不利于维护财产的安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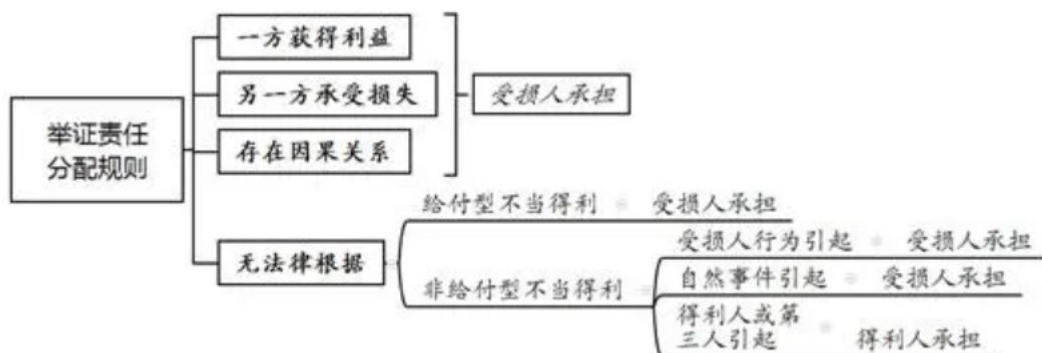
即使得利人在抗辩中就案涉给付主张存在相关基础法律关系，也仅作为对受损人主张的积极否认，不改变待证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要件事实是否“无法律根据”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受损人作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一方若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如案例二中**，陈某系引发涉案财产变动发生的主体，其对发生财产变动的原因最为知悉，且具有充分的举证能力。陈某可通过提交原待转账的对象、目的、金额、转账附言、转账对象确实与薛某卡号存在两位数字颠倒的情形等证据来证明其确因操作失误转账，故陈某需要证明的“无法律根据”属于一系列确定的事实而非消极事实，由陈某承担举证责任较为合理。

## **(2)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无法律根据”的举证，往往需要借助对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承受损失、损失和获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来完成。对于“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归属，通常由引起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承担举证责任。

**其一**，受损人因自己的行为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由受损人自行承担举证责任。**其二**，自然事件引起的不当得利，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由受损人承担举证责任。**其三**，由得利人或第三人引起的不当得利。在此情形下，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利益失衡状态并非由受损人的主动行为造成，即受损人系被动对其财产权益失去控制力，受损人一般无法通过财产权益的变动过程来证明对方获得利益无法律根据。考量当事人举证能力强弱、距离证据远近等因素，**必要情况下由得利人对其取得利益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更加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 4.得利人返还义务范围的认定

在认定得利人构成不当得利的基础上，应对得利人需要承担的返还义务范围进行认定。不当得利在性质上属于法定之债，得利人返还义务范围由法律直接规定。得利人返还义务的范围依得利人主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有所不同。

##### (1) 得利人善意与否的认定标准

**得利人善意与否的认定，取决于得利人主观上对其获得利益无法律根据是否明知。**得利人基于对不动产登记、动产占有、商事登记等表象的认识与真实情况不一致并不知悉时，该认知状态在法律上可被评价为善意。相反，如果得利人因不知被社会大众普遍知悉的事实而获利，尽管从其个人角度而言确实不知，但这种不知的状态归因于其粗心大意的过失，则得利人仍需要承担责任。**在得利人对其“不知”状态的形成存在故意或负有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得利人不能被判断为善意。**

关于得利人是否善意的举证责任分配。受损人如主张得利人为恶意得利，需举证证明得利人系明知无法律根据而获得利益。**如受损人不能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则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可以认定得利人获得利益为善意。**

需要注意的是，受损人主观上是否存在可归责性，不属于不当得利案件的审查范围。不当得利与侵权损害不同，无需依据得利人与受损人的过错确定各自的责任比例。**因此，在确定得利人应返还的范围时，无需考虑受损人的主观状态。**

## （2）善意得利人返还义务范围的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986条规定，善意得利人返还义务范围以其现存利益为限。如果现存利益灭失，善意得利人的返还义务可予免除。如果善意得利人现存利益小于受损人的损失，则得利人应当以现存利益为限承担返还义务。如果善意得利人的实际利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则得利人仍仅以受损人的客观损失为限承担返还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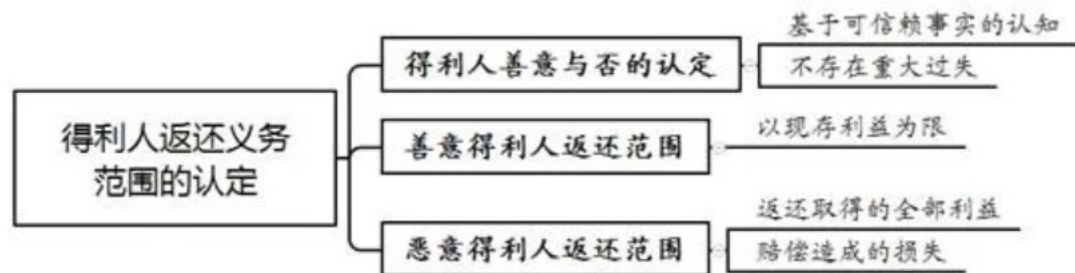
现存利益是指得利人在受损人提出返还请求时尚存的利益。关于现存利益的认定，应重点审查以下要点：**首先**，得利人的现存利益应以受损人提出返还请求之日为准。**其次**，关于得利人返还利益的形态，可以采用返还原物和偿还价款两种方式，不以标的本身为限。**除标的本身外，以下亦属于现存利益的范围：一是**因不当得利标的产生的孳息以及得利人因该标的所取得的其他利益；**二是**得利人因消费他人利益而节省的消费开支；**三是**得利人因不当得利标的从第三人取得的损害赔偿等。

关于返还利益时可扣除的费用，包括得利人为获得利益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得利人因获得利益导致自身利益消灭或价值减损等。前述损失的扣除应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首先**，应以得利人主观无过失为前提，如得利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上述损失发生，则不予扣除费用；**其次**，得利人所受损失应与得利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最后**，损失系因得利人信赖其得利有法律根据而发生，即只有善意得利人方可扣除费用。

## （3）恶意得利人返还义务范围的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987条规定，恶意得利人应当返还其取得的全部利益。无论所得利益是否存在，恶意得利人均应承担返还所得利益的责任，若造成损失还应进行赔偿。恶意得利人较重的返还责任还体现在返还所得利益的附加利息。所得利益为金钱时，应当按法定贷款利率自得利时起算利息，并将利息一并返还受损人。如果受损人的实际损失大于恶意得利人所获利益，恶意得利人还需对不足部分另行赔偿。

自始恶意得利人的返还范围为取得的全部利益以及该利益产生的全部孳息。嗣后恶意得利人在知晓获益无法律根据前，应适用《民法典》第986条规定，返还义务的范围以现存利益为限；在知晓获益无法律根据后，应适用《民法典》第987条规定，返还其取得的全部利益。**如案例三中**，在甲公司发现多转款项并向梁某催讨之前，梁某对多收款项并不知情，其不存在主观恶意。然而在甲公司进行催讨之后，梁某明知甲公司多转款7万元应及时返还款项，但却拒绝返还，致使甲公司利益受损，此时梁某在主观上构成嗣后恶意。因此，法院判令梁某返还7万元不当得利以及自甲公司催讨之日起至实际返还利益之日止的利息。



#### 0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